走进乡村看小康

□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突出短板，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重点任务，着力构建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农业生产环境和干净整洁、村美人和的农村生活环境。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白灵村平坦整齐的村道旁，绿树如荫，月季花娇艳多姿。村委会主任曹明杰说，近年来，该村先后对全村主干道和巷道进行了“绿化、美化、亮化”，建成文化大礼堂、污水处理厂，大力推进厕所革命、垃圾分类，整村环境焕然一新。

村庄干净整洁是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如今农村厕所也成为村庄颜值“加分项”。在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毛湾村的文化广场，傍晚常能看到相约来跳广场舞的村民。“以前大家都用旱厕浇菜园，在村口都能闻到味道。别说跳广场舞，过年请客，亲朋好友都不愿意来。”村民欧阳汉羊说，那时不仅蚊子苍蝇多，气味也很难闻，大伙儿都不愿出门。

为了美化农村环境，彭泽县结合城乡环境整治开展厕所革命，把旱厕改造与美丽村庄、美丽庭院、清洁家庭评比相结合，鼓励改旱厕为水冲式厕所。毛湾村党支部书记柯培龙说，村里拆除旱厕建成污水处理系统后，困扰村庄多年的异味终于烟消云散。村里还给每家每户都做了青砖黛瓦的徽派装修，大伙都说如今像生活在公园里。

近年来，各级农业部门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农村污水治理与粪污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8%，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不断提升，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特色产业加速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在广西贺州市平桂区羊头镇龙山村的蔬菜大棚里，村民马忠明种植的彩椒长势喜人。“自从村里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环境变美了，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了。”马忠明说。

过去，龙山村产业结构单一。自2018年起引进推广山东寿光的先进技术，建设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龙山村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目前，全村建成果蔬大棚140多个，主要种植彩椒、番茄等特色果蔬，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及粤港澳大湾区。村民收入也有了大幅提升：流转土地的农户每亩每年可获得租金800元；该村还以集体资产入股，每年可获取5万元以上分红；村民在基地务工，每人每天可收入80元。

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础。但发展产业，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因地制宜，找准路子。

“得益于好的风景和生态，我们捧上了旅游的‘金饭碗’。”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庄镇乙日亥村党支部书记韩乙拉四说，在实施精准扶贫中，乙日亥村将乡村旅游作为主打产业，在村口处流转土地80亩，打造花海基地。如今，乙日亥村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不仅村民收入大幅增长，还吸引了不少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创业。

提高农民增收能力、扩展农民增收渠道，离不开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目前，我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100%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3%，农民安全饮水有保障，行政村通光纤、通4G的比例均超过98%。

要素活力进一步释放

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大的动力是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全面部署、系统推进农业农村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制定了一批成熟定型的法律制度，基本构建了促进农业农村健康发展的“四梁八柱”。

一方面，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15亿亩承包地确权到承包农户，近2亿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率超过96%；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在全国104个县市区和3个地级市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同时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引导农民发展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相关权益。

增加农民收入是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门依托乡村资源，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条增值收益。据不完全统计，产业融合发展使农户经营收入增加67%。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正确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农民和市民的关系，才能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经世言

『美式排名』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郭言

近日，美国彭博社发表一项所谓“全球抗疫排名”，通过剔除“累计确诊人数”“累计死亡病例”等关键核心数据，将美国捧上榜首，令国际社会舆论哗然。

无独有偶，在东京奥运会上，眼瞅着美国金牌榜落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媒体也耍起小花招，迅速按照奖牌总数进行排名，使美国“摇身一变”位居榜首。

用唯我独尊式的“美式标准”炮制“美式排名”，是美国一些人擅长的套路，其本质仍然是“美国优先”心态作祟，也是美国不愿面对实力下降、寻求“精神胜利”的真实写照。

然而，无论美国媒体如何挖空心思，都掩盖不了美国政府治理低效、抗疫失败的事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把政治私利置于人民生命健康之上，使其国内抗疫节节败退，导致3600多万人感染、60多万人死亡，病亡人数居全球第一。在这些美政客罔顾事实、违背科学、漠视生命的操弄下，美国疫情“恶化—缓和—反弹”的现象反复上演，彭博社不顾事实，把美国抗疫“吹上天”，也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虽然抗疫工作一塌糊涂，但至少在精神层面，美方一些人取得了胜利。

这种不愿意正视事实，不愿意承认失败和差距的美式“精神胜利法”，正在多个领域蔓延。比如，在国际赛场上，美方一些人同样擅长颠倒黑白。奥运奖牌榜名次由金牌数量决定是国际奥委会制定的规则。但为了让美国赢，美国一些媒体一边“操纵”奖牌榜大搞“美国优先”；一边攻击中国体育制度，声称中国运动员是没感情的“金牌机器”。其毫无下限的做法，连美国网友都看不下去，反讽“好像美国不执着于奖牌排名一样”。在美国人输掉男子百米决赛后，美媒竟暗讽意大利人夺冠不干净，这一操作更是被意大利奥委会怒斥“输不起”。

“美式排名”除了自我麻痹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哈佛大学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比6月下降10个百分点，充分显示美国民众对现政府的信心不足。应当看到，无论怎么排名，美国国内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种族对立、政治极化的事实都不会改变，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病毒泄漏、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等疑云也不会散去。如果美方一些人还有良知，就应该让美国人民了解真实情况，让那些利益至上的美政客无处躲藏，给世人一个应有的交代。

在公平正义、科学事实面前，任何别有用心、欺世盗名的伪装，一切意识形态的操弄都只会自曝其短、自取其辱，最终自食其果。

夺冠时刻

8月5日，东京奥运会第13个比赛日，中国军团收获2金1银。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得乒乓球女子团体冠军。全红婵夺得跳水项目女子10米跳台冠军。中国代表团在奖牌榜上以34金24银16铜继续领先。

在田径方面，中国军团再次取得突破。在男、女4×100米预赛中，由苏炳添领衔的男队和韦永丽领衔的女队双双晋级决赛，创造了接力队奥运会的最佳战绩。

图为中国队选手王曼昱（左）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庆祝。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上接第一版）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所副主任、研究员许英明则认为，下半年国际市场供需缺口将会有所缓解，但依然较大，供给端复苏速度仍不及需求端。

“外贸高速增长有国际订单转移的因素，国外产业链由于疫情中断，去年以来部分国际订单转向我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长湧表示，疫情形势好转，国外产业链供应链恢复，并不意味着订单会重新转出去。“尽管国外产能逐渐恢复，但是从国际贸易运作规律和跨国公司防风险的规律来看，不会出现大规模订单转移现象”。

商务部外贸司近期监测的情况显示，约40%的外贸企业新签出口订单同比增长。外部需求回暖、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将继续支撑我国外贸发展。

着力解决“一箱难求”问题

随着去年同期基数逐步抬高，下半年外贸增速将有所回落，外贸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原材料价格高企、海运物流不畅等问题进一步挤压外贸企业利润空间，也影响企业接单意愿。对此，李兴乾表示，我国下半年将重点围绕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研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切实降低外贸企业综合成本。

许英明认为，下半年要全力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一方面，继续投放国家储备，并向中小企业有所倾斜，增加有效供给，稳定原材料价格。另一方面，密切跟踪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加强原材料市场预期引导。”同时，着力解决“一箱难求”“一舱难求”等难题。支持企业提升集装箱产量，进一步主动扩大进口。鼓励海运企业、船公司、港口加强合作，引导企业增加主要海运航线临时船舶的运行次数。此外，落实好对外贸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落实对中小出口企业税费、金融支持政策，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稳定生产。

专家表示，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不能再靠传统优惠政策提振出口。在稳定出口部门就业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切实做好扩大内需的工作。要坚定不移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因外部环境而改变自身的中长期目标。

建党百年·经济战线风云录

□ 本报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

标本施治稳经济

——新生政权治理恶性通胀

1948年秋至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及其他重要战役，以气势磅礴的大手笔，精心绘就解放战争恢弘的历史画卷。

走进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回的一座座城市，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扑面而来的和平渴望、重整河山的民生期待。如何稳定经济秩序、赢得人民拥护？如何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无一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精心筹组中财委，治理烂摊子

当时，接踵而至的战后经济社会治理难题，错综复杂、异常棘手。为了恢复工业、交通，安定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支付大批经费，而且被俘的国民党军人除自愿回家者外不能遣散，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及相关机构的公职人员，除有罪行的已经逃跑外，其他人员都要收容下来，这就给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引起财政支出飞快上涨，而收入却因战争状态增长很慢。

不仅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流通领域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将其概括为两点：一是投机活动猖獗，市场上形成一批专事投机的资本；二是人们对人民币存在着不信任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争购银元、黄金和外币，阻挠人民币占领市场，并刺激物价上涨。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否有能力稳定经济形势、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生产，使新生政权在经济上、政治上站稳脚跟？这是远比当时仍在进行的军事斗争更加艰巨的挑战，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民族资本家非常关注并寄予厚望的。对此，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提前部署。

1949年元旦，党中央召开了一次财经座谈会，朱德、董必武、刘伯承、陈毅等人出席。大家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同年3月，毛泽东在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5月31日，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文件。

《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关系；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地及各省所属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的同时，党中央也开始考虑并处理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问题，努力稳定物价，确立人民币作为唯一通货的地位。当时，人民币大量进入市场时，投机资本拼命哄抬金银、外币价格，导致使用人民币根本买不到成批的东西。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为商品标价，将其排斥在市场之外。为此，我们党同投机资本在银元市场展开了较量。

集中组织“银元之战”，确立人民币法定地位

在捍卫巩固新生政权的经济斗争中，上海成为令人瞩目的主战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军事斗争的硝烟尚未褪尽，经济斗争的较量旋即展开。当时，解放战争导致的巨额军费开支，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推动物价上涨，令投机资本家有机可乘。上海解放头一周内，银元价格被迅速哄抬，成倍上涨。起初，党中央投入的人民币数量有限，不足20亿元，大部分浮于市面，充当本位币的依旧是银元。

当时，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已被命令停业，可事实上却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在这里聚集多达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则人数更多。不法投机商人大肆炒卖银元，推动黑市价从1400元涨至2000元以上，带动物价指数大幅上涨。

面对投机分子的猖獗，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妥善解决，民心将不得安抚，市场秩序将更加混乱，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更加无从谈起。

上海最初设计的斗争方案，是以银元制银元，即集中大量银元抛售到黑市，先通过加大量的流通压低银元价格，再宣布禁止银元流通，以人民币取而代之。于是，1949年6月5日，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在电告中央后，随即采取行动，先抛出10万银元，并在全市举行“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然而，市场反应却并未如预期所料，10万银元很快被投机商人一吸而空。6月7日，每块银元价格竟涨到1800元人民币。

面对投机者我行我素、对抗新政权维护经济稳定的猖狂行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果断决定采取釜底抽薪之策，着手查封金融投机市场的集中点。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毛泽东随后回电表示赞同。很快，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银元投机斗争策略的一则电报稿，最后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等。《指示》提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同时指出：“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因此，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

经过周密部署，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关闭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投机商200余人逮捕法办，取缔银元黑市交易。与此同时，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并在市面大造舆论，人民币趁势占领市场，成为唯一合法流通货币。

上海解放之初，人民币与银元之间的市场博弈，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打击黑市银元投机、锚定人民币作为唯一通货的法定地位，主要是因为通过经济手段、行政措施和宣传攻势三管齐下，强势熨平投机风潮引发的市场波动，但要长期维护经济平稳运行和百姓安居乐业，则必须遵循经济发展内在客观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这在接下来同样发生在上海的“米棉之战”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敞开抛售重要物资，平息全国涨价风潮

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后，新解放的大片地区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加上华东、华北先后暴雨成灾，上海粮价暴涨，随即影响到纱布等物资的价格，很快扩展至天津、武汉及中原一带。

1949年7月15日，上海有80%的黑市高息贷款用于粮布投机。7月16日当天，上海每石米价由5万元升至6.7万元，再次出现物价波动。为解决这一困局，陈云率领宋劭文等人专程赶赴上海，连续多天听取汇报、调查研究，然后于7月27日召开了各解放区的财经会议。

陈云在会议上指出，物价上涨的根源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军费、修复铁路的费用、工业投资、农产品收购等开支巨大，财政入不敷出，只有在战争胜利结束、财政收支趋向平衡时，才可能稳定物价。当前，要通过有计划地吞吐，把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掌握在手里。会议整整开了20多天，最后明确了解决方案，决定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提出发行公债、在乡村抓紧征粮、在城市抓紧税收、精简节约等具体办法，采取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上海的应急措施。

会议结束后不久，10月中旬物价涨风再起，出现了第三次物价波动。10月底，人民币累计发行比同年7月增加3倍。投机商人乘机活动，抬高物价，在北方主要囤积粮食，在南方主要囤积纱布。

从11月1日起，刚刚成立不久的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集中调运，并指示国营贸易公司在控制主要物资的同时，趁抢购风盛把呆货冷货抛给投机商。11月25日，当各地物价上涨最猛时，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统一行动，敞开抛售粮食、棉布等主要物资，市场行情大幅度下跌。同时，又催征税收，收紧银根，冻结贷款，多措并举，迫使投机商不得不将高息拆借资金囤积的货物贱价抛售，愈抛愈贱，直至周转不灵破产。很短时间之内，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跌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得以平息。之后，不论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的商品价格，都保持在预计的水准。

事后，上海一位有代表性的资本家感叹道，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可以稳住，这是上海工商界没有料到的。在此之前，有些资本家曾经说：“共产党军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经济上打0分。”言外之意是将来还得依靠他们管理经济。他们以前根本不相信党和人民政府能够稳定物价，此时才心服口服，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管理中国经济的卓越能力。

1950年2月，由于军费仍然未降下来，政府担负公职人员数目进一步扩大，巨额财政赤字主要靠大量增发货币弥补。2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炸毁发电厂。上海全市工厂除少数有自备电力的以外，大都被迫停工。人心动荡之下，商人只购不售，投机资本伺机再次兴风作浪，因此出现了第四次物价波动。当时，薛暮桥与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在周恩来总理和陈云的领导下，每晚收集上海市场情况，提出次日粮食、纱布等商品牌价，报周、陈审批，于深夜电告上海。经过精心分析和研究，中财委采取增产节约、抛售物资、紧缩通货等措施，制止涨风。上海以外的各地纺织厂延长生产时间，突击增产；粮食公司在2月份平均每日抛售2万石大米，占市场成交总额的80%；花纱布公司从3月初开始控制价格，保持粮布合理比价。到1950年底，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

薛暮桥回忆说：“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了四次物价大波动，其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收支不平衡，货币发行过多。自1948年12月至1950年2月1日，人民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4.1万亿元，增加220余倍。这样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人民解放战争空前大规模胜利进军所产生的特殊的暂时现象。我认为，不论采取何种措施，只要通货膨胀，物价就必然上涨。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消灭财政赤字，制止通货膨胀，使货币发行和商品流通同货币的需要量之间保持平衡。”

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银元”“米棉”展开的货币与物资之争，体现了我们党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和恶性通货膨胀的高超综合治理能力。一方面，不法资本遭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另一方面，我们党也借此积累了运用经济规律的经验，提高了管理能力，开始掌握稳定市场的主动权。由此，我们不仅从根本上稳定了物价，争取了国家财经状况根本好转，而且为后来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努力为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创造了条件。